

## 1947年,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始末

● 吕传彬

早在1943年,美国以盟军名义在华作战,以昆明、新津、重庆等基地为其空军活动的大本营;北战场以西安为前线机场,并将设备简陋的西安机场由原来的1200米扩修为1800米,还增修了跑道一条和滑行道、停机坪、疏散道,使机场可容两个大队约100架左右的飞机,B-24巨型飞机也勉强能够起落。同时,又在鄂县修建一个规模较大的机场,以为西安基地的辅助机场。

1946年4月,蒋介石忽然下令将西安机场延修至2300米,并翻修旧跑道、停机坪。先后拨扩修工程费6亿元,由空军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机场工程所,并责成西安区司令督促,于8月开工,至10月中扩修完竣。不言而喻,这是蒋介石集团为了加强其空军在西北地区的储备力量,使西安机场能够容纳更多的飞机,为进犯陕解放区作准备。

1947年2月29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下机后,蒋径至空军十一大队部,稍事休息,即召集国民党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副主任裴昌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至下午2时会议结束又匆匆飞返南京。

当晚,刘国运在空军司令部召集空军驻西安部队副队长以上、司令部副科长及作战科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宣布蒋介石亲自来西安所作进犯延安的军事部署要点,接着又对空军出击作了详细部署。他说:“空军以协同陆军作战为主,必要时可以采取单方面出击。十一大队P-47战斗机在西安有40架,以担任侦察、掩护陆军攻击及陆空联络为主;九中队B-25轰炸机9架,以轰炸为主;由南京派来C-6运输机10至20架担任空运;必要时再从南京、徐州调P-40及P-51战斗机到郑州基地参加作战;太原方面的空军也同时参加作战。从现在起部队停止休假,至战事结束

为止。十一大队从明日起,逐日轮番派飞机至陕北各地进行侦察,发现敌情,立即报告。九中队整机待命出击,使用的炸弹,因延安没有大的建筑工事,无需重量炸弹,只需以杀伤为主的轻量炸弹。储存在汉中、宝鸡各站的油料和适用炸弹大部运来西安备用,能陆运者漏夜陆运,不能陆运者空运。运输力量,主要是集中西安空军所有车辆应用,不够时由西安绥署调补给区汽车协助。以鄂县、临汾、运城、洛阳等各站为辅助机场,应防迅速加强准备。所有补给设备等事宜,统限3月10日以前集中完毕。”他并严令与会人员绝对保密,布置工作时,不准丝毫泄漏军事行动的机密。

从第二天起,C-46运输机10余架便开始从南京陆续运来油料,随即又日夜不停地由飞机、汽车、火车运来各种作战物资。入夜,总站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汽车出入通宵达旦。

接连几日,从清晨到黄昏,飞机不停地分批飞往陕北各地侦察。据侦察报告。当时,解放军在铜川、韩城一带大军云集;延安方面却未见有大规模军队的调动迹象,延安城内安静如常。附近地区亦无特殊情况。据程藩斌回忆说,直到最后两天,他们才发现有小部队行动。指挥部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延安方面并未获有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延安广播电台也没有透露国民党空军有进犯的迹象。胡军官员对此颇为高兴,有一天盛文对程藩斌说:“平日延安方面消息最灵通,这次因为我们部署迅速,行动机密,致敌人无从探悉,我们准可一举而下延安。”露出一副得意神气。

短期内在西安、郑州、太原等地集结各型飞机近百架,是国民党空军在一个战场上使用飞机之多的新纪录。3月13日,胡宗南下达进犯延安的总攻击命令。14日晨,西安机场第一批B-25型轰炸机4架,满载炸弹,在P-47战斗机掩护下,向延安地区进行疯狂的轰炸,以配合地面部队进攻延

安。随后,各机种接二连三地起飞,终日未稍间断。

经侦察照相证实,连日的轰炸并没有炸到什么重要目标,仅使地面徒有无数弹坑而已。陆军开始进攻后,除第三天在洛川以北与解放军一度发生战斗外,并无大的激烈战斗,可是前方却报告说战事如何“激烈”,吹得天花乱坠,使得西安指挥部的高级官员,紧张了几天几夜;宣传机关也忙于发布“胜利”战报,以愚弄不明真相的人;后勤部则忙着征调军用物资,向前线输送;空军基地人员忙着加油、挂弹。整个西安市被所谓延安地区的“激烈战斗”闹得马仰人翻。

18日,战事进行到第五天,国民党侦察机回来报告:“我军先头部队已进抵延安近郊,并发现延安以北有共军一部向晋陕方向转移,已通知部队追击。19日拂晓据飞机侦察报告,昨天发现的共军已不知去向,也无我军追击;我军大部部队已围住延安城,城内街道上未见行人。下午又据飞机侦察报告和前方电报:我先头部队已进入延安。”

胡宗南部在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的情况下进抵延安后,大肆宣传,把“延安大捷”吹嘘得比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攻克柏林还要“伟大”。“捷讯”传到南京,奖金、慰劳品、勋章、升官状等也迅速飞来西安。胡宗南还在西安、延安专设招待所,招徕中外记者和各界人士到延安去参观,并大摆庆祝会、摆庆功宴,煞有介事地闹了许久。

胡宗南利用这次“胜利”极力把自己扮成“英雄”,一批喽罗也争着冒充“功臣”,不可一世。在一次庆祝会上,胡宗南的总务处长蒋某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从此胡先生不会老死关中了,我们都有出路了。”未曾想好梦不长,胡宗南部在侵占延安后一年的时间中,一个一个的整编派、整编师乃至整编军相继被歼,熬到1948年4月不得不撤出延安,龟缩关中。

## 明代纪常在陇右的惠政

● 王志强

据《巩昌府志》载,明代嘉靖时期,巩昌府官场有一位名闻天下的贤臣,那就是纪常。纪常分巡陇右时期,整顿吏治、打击盗匪,率民开渠、发展民生,获得了陇右士民的交口称赞。

纪常,字元正,一字守经,号西皋,出生于河北文安,官至河南左布政使。

嘉靖十三年(1534年),纪常任陕西按察司金事,分巡陇右道。陇右道自古民风剽悍,号为难治,官员畏之如虎。当时的陇右一带,清水豪族马氏凶悍暴虐,马兴招集亡命,聚众数千人,在铁炉山一带占山为王。马兴依靠山泽之险,打退了官府的几次

围剿,气焰更加嚣张。在纪常到任之时,陇右一带群情慌张,百姓们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

纪常刚一到任,便着手平乱并招募人手,扩充民团。后纪常令参将崔嵩等设伏于石门,带领军队前后夹击,大败马氏乱军,斩马兴于乱军之中。就此,陇右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史载“人心大悦”。

纪常在陇右道的民生经营方面成绩显著。陇右道因干旱缺水,百姓生活常有不便。纪常率领百姓勘察地脉,依据河脉的走向凿井取水,最终凿出了十五口大泉井,成功解决了百姓们的饮水问题。直至清末,这些泉井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汲引

不穷,至今利赖”。

在文教方面,针对巩昌府文风不振,少有科贡人才的现象,纪常敷布教化,扩建崇义书院,对巩昌府的文教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在陇右的政绩,纪常深得陇右士民的爱戴,“吏畏其威,民怀其德”。为纪念纪常的仁政惠策,李念慈特撰《分巡道纪公传》来旌表他。140年后,纪常的后裔纪元,又来到陇右巩昌府担任太守,成为一时佳话。分巡陇右的任务完成后,纪常转任陕西按察司副使,直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纪常在陕西任职期间,“秦中风纪振肃,号两察院”。

丝路文化巡礼



## 礼县民间社火的代表——高跷

● 薛小平 刘小平

礼县城关镇东台村民间社火历史悠久,代代相承,其内容除了舞龙、狂狮、划旱船、赶毛驴、扭秧歌、耍花棍、大头娃等外,当属“高跷”最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在县境内高跷社火艺术中独具魅力。东台村民间社火头,现年73岁的李心存老人说,自1962年十多岁起每年都要耍社火,参与高跷表演。

东台村高跷,俗称高脚子,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社火艺术,也是本村社火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种类,表演内容丰富,所扮演的折子戏剧目主要有《黄河阵》《万仙阵》《三打祝家庄》《反五关》《过玄关》等10余本。据李心存老人说,“经祖先流传,在唐代、宋代时期道教和佛教盛行,每年正月十三,高跷等社火主要是在本村敬神时演出,俗称神社火。”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跷社火从单一的以“祭神”为主的宗教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演绎各种传统社火剧目、历史典故人物,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教化民众崇尚忠孝的大型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在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社火表演活动中,既恪守传统的祭祀礼仪,又不断加入新的文化元素,使这一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绽放出绚丽夺目的艺术光彩。

高跷表演时一般选本村15到30岁的年轻人参与,最少为15架,最多时为30多架。高跷社火的传统脸谱谱式,也属一种极为讲究的脸谱艺术,大致与传统秦腔剧中的人物为主,分“生、旦、净、末、丑”等多种脸谱,人物脸谱形象表现的要活灵活现。其次是穿服装、戴头帽、挂胡须。表演者一般身穿四蟒(戏曲中文官角色所穿的蟒袍)四靠(戏曲中武将角色所穿的铠甲即扎靠)戏装。再次就是绑腿,分别用最高2米左右,最低也要在1米左右的松木椽或者柳木椽制作的木腿子紧系在小腿外侧,扎绑结实后,由其他人用长木棍扶住或表演者靠在墙上等待表演时再独立行走。表演时手持的道具具有“矛、锤、钺、戟、棒、枪、铜、鞭”等,根据扮演者手持的器物,使观众不难看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礼县社火每年正月十四在邻村庄进行拜年交流演出,正月十五进城演出。每一场的表演程式先是舞龙(也叫打场子),其次是狂狮子(耍狮子),接着就是高跷表演,数十架高跷者依剧情排成次序绕圈子、走圆场,在女子手持花盆扭“十”字步走场子和唱社火曲子的男长者的唱曲声中走场表演。唱曲有《撒金钱》《十对花》《赶船》《五鼠闹东京》《姑娘采花园》等。再下来表演的是打起锣鼓、划旱船、赶毛驴、耍花棍等传统社火节目。正月十六晚将高跷改为夜社火,装《五雷阵》等武身子,逐家入户表演,谓之“卸将”。一年的社火活动由此结束。

原汁原味的东台村高跷社火是礼县民间社火艺术中的一支奇葩,不仅丰富活跃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也对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曲水流觞千古胜

● 郑学富



清雍正时期青花“兰亭会”笔筒,藏于故宫博物院。直壁,圈足,制作考究,工艺精细,造型规整,瓷质细洁而色白,胎坚,釉润。据专家考证,此笔筒用的很可能是浙江产的上等青料,从其坚细的胎质,用料的纯正、高超的烧造技术及绘画技巧来看,当为景德镇御窑厂的高手所做。外壁通景绘《兰亭修禊图》,画面上青山绿水,花草繁茂,溪中清流激湍,景色恬静宜人。所绘人物众多,细腻生动,栩栩如生。图案主题突出,由青花、釉里红绘成,色泽艳丽明快,淡描双勾填色的画法清秀典雅,釉里红点缀的桃花深浅适宜,恰到好处,使画面春意盎然,充满勃勃生机,再现了兰亭流觞赋诗之盛况。陆游有诗曰:“曲水流觞千古胜,小山丛

桂一年秋。”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共42人会聚山阴兰亭“修禊”。这次兰亭雅集,王羲之乘着酒兴,写下了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此文自然天成,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书法家。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因其特殊品位与爱好,促进了瓷绘艺术的新发展,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艺术品位极高的山水纹瓷器佳品。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业较前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瓷器品种繁多,釉色齐备,被誉为历代之冠。瓷器纹饰中的人物故事画题材选择不仅广泛,而且描绘细腻,人物比例恰当,更富有书卷气,“兰亭会”笔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代表了清雍正时期瓷绘艺术的最高水平,具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书法文化气息,极具艺术魅力。有专家赞誉:“兰亭会”笔筒是“天下第一行书”的完美呈现,也是与中国传统书画结合的极致表现。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还是研究《兰亭序》的重要参照资料,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

早春二月,笔者参观武汉二七纪念馆,版面上那一幅幅黑白的历史照片,展柜里陈列的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令人沉浸在发生于近百年前的那场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大罢工的氛围之中,感受着林祥谦、施洋等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屠刀所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参观展览的第三部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内容时,一枚小小的徽章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是一枚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徽章,圆形,银质。正面内容为内外圈两个部分,中间内圈内镌刻中国铁路民国早期徽志“双翼车轮形”图案及“劳工神圣”四字,所有文字均为繁体楷书,字体端端正正,排列井然有序。外圈内从右至左镌刻有“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十三字,两边有梅花装饰。徽章背面刻有“汉同丰”字样,“汉同丰”为制作这批徽章的银楼。徽章上部有部分凸出,穿孔内穿有挂链,用于会员佩戴。

武汉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既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亦是滋润红色革命的一方沃土。1920年10月,武汉就正式成立了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组成的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称为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192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江岸铁路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同年4月,京汉铁路全路在长辛店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决定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不久,江岸、郑州、长辛店等16个地区的工人俱乐部相继改为分区工会,其中江岸分会拥有两千多名会员,这枚徽章即是设计制作于这一时期。

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进行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粗暴干涉和破坏,总工会被迫迁至湖北武汉的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江岸机车

永远的纪念——  
显影京汉铁路大罢工史事的证章

● 李奎清



修理厂工人拉响了罢工的第一声汽笛,京汉铁路全线工人总罢工正式开始,所有车辆一律停驶,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陷入瘫痪,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团结和战斗力量。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的支持下,出动军警袭击总工会,在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共产党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林祥谦和共产党员、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数十人惨遭杀害,数百人受伤,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史称“二七”惨案,谱写了载入中国工

人运动史册的光辉灿烂的一页。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自由而战,掀起了武汉乃至全国的工运高潮。为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铁道部及武汉市人民政府于1956年在江岸修建了武汉二七纪念馆,1958年树立起“二七烈士纪念碑”,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碑名。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的伟大政治斗争,中共著名活动家李大钊、陈潭秋、林育南、邓中夏、项英等都参加了这次罢工运动的领导,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枚徽章是1959年武汉二七纪念馆征集文物时,从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黄正兴手中征集到的,品相完好,作为二七大罢工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件实物见证,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95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